

## 忆父亲二、三事

张群华

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。他一生中有一大半时间是在思索；探索科学真理，或是考虑社会问题。他很少教训子女，可是从他献身科学、治学严谨的精神，到为人处世的原则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这就是“言教不如身教”吧。出国之前，我请他写几个字。他用毛笔中楷写了“莫道人之短，勿说己之长。施人慎勿念，受施慎勿忘。勿以小善而小为，勿以小恶而为之。”短短的几十个字，足以作为我一生的警句。我常想，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做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大大改善。

抗日战争初期，父亲任教于由南京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。1941年去昆明主持天文研究工作。天文台设在昆明郊区凤凰山上，生活条件很差。父亲为了我们在重庆有比较好的学校，宁可自己一个人在昆明艰苦奋斗。点煤油灯，简食瓢饮，种下了胃溃疡的病根。要说父亲克己为人，那例子是不胜枚举的。

抗美援朝开始后，与西方的科学交流被禁止，这自然是父亲反对的。反修之后，又停止了与苏联交换天文资料。记得当时父亲十分感慨：这种强加于科学研究上的干预何时能了？受损害最大的是祖国的科学事业。

尽管父亲的为人几乎是无懈可击的，可是以他的地位和经历，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不免受到很大的冲击。无论受到怎样不合理的对待，他始终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，决不趋炎附势、适迎“四人帮”及其帮凶之所好。他曾气愤地说：“这么多年就只让大家看这几个样板戏怎么行！”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使我想起鲁迅的名句：最大的轻蔑是无言，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。文革之后有一次他在马路上跟一个过去整过他的人打招呼，同行的人对他说：“运动当中他动手打你，你还跟他那么好？”父亲说：“是吗？我都忘了有这回事。”这是件小事，却反映了父亲的心灵翱翔于九天之上，其胸怀有如北溟之宽广。

父亲静静地去了，可是他那平易近人的形象，他的正直、谦逊、孜孜不倦的精神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，成为后人的楷模。学习和发扬他的精神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。鲁迅说：“死人若不活在活人的心里，那便是真正死掉了”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父亲没有死，他活在我们心中。